被黑帮利用的改良派张桂梅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被黑帮利用的改良派张桂梅

November 24, 2023

被黑帮利用的改良派张桂梅

列宁道路（读者来稿）

近年来，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作为毕生扎根边疆教育事业、通过教育改变贫困女孩命运的典范，得到了特色专制政府的大规模宣传和表彰。2020年12月3日，黑帮中央授予张桂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她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称号，习沙皇亲自为其颁奖；2023年10月，张桂梅“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以张桂梅事迹改编的《我本是高山》电影也于近日上映。由于剧情与真实事件存在较大偏差，存在污名化女性（包括张桂梅本人）和贫困群众、消解社会主义理想的嫌疑，上映伊始就遭到了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批判，而《我本是高山》的编剧和《中国电影报道》对批评声音的否认和诋毁加剧了舆论冲突，甚至导致影片下线。作为革命的马列主义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张桂梅以及这一系列事件的性质？

（1）张桂梅是当代武训吗？

张桂梅所献身的事业是改良主义性质，不可能解决而是掩盖了根本的社会阶级矛盾，可以说是革命左派的常识。

武训乞讨办学，宣扬的是封建礼教，巩固的是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主导的封建秩序，而且是在清政权风雨飘摇、反帝反封建任务已经提上历史议程、现代教育体系和思想技术不断传入的时代，是旗帜鲜明的开历史倒车行为。因此，从清政府、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汪精卫，甚至蔡元培这样的文教界人士，一旦他们决定与封建统治阶级妥协，就会开始不遗余力地鼓吹“武训精神”。毛泽东所批判的电影《武训传》受文化界热捧的现象，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即将向社会主义改造过渡的时代，那些不愿往前走、只想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精英，寄希望于塑造武训这样的形象来宣传无损旧秩序的阶级调和，而不是彻底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教育。因此，毛泽东批《武训传》，实质不仅在于武训本人做了什么，而且在于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在吹捧武训。不是说教育不平等不应该解决，而是说武训的解决方案是在跪舔封建统治阶级（也确实换来了他们赐予的牌坊），那些宣传武训的人是在借这个幌子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

从掩盖阶级斗争与革命必要性的意义上，可以说张桂梅起到了类似于武训的作用。她把这种作用说成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下所实现出来的，迷惑性就更强了。毛泽东这样评价电影《武训传》：“《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

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说：是通过资产阶级教育来改变个人的命运，还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改变工人阶级的命运，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像张桂梅这样的人，处在特色统治日渐支绌、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觉悟有待觉醒的斗争时代，既不去触动特色经济基础，也不去抨击其上层建筑，反而竭尽所能地将贫苦群众的子弟引入个人奋斗的轨道，并以此模糊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斗争意识，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

张桂梅模糊斗争意识的作用，被特色黑帮察觉到了。他们所感到遗憾的，是改良派张桂梅不够黑帮，意识形态作用还发挥得不够显著。于是，他们不但因为张桂梅的反动方面给予了张桂梅充分的褒扬和报道，而且还给她拍了电影，把她的事迹剪裁成了自己希望的样子。接下来，我们将详细分析，究竟是什么人在为张桂梅唱赞歌。其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声音，一种是反动的吹捧，另一种是来自改良主义的肯定。

（2）反动势力对张桂梅的吹捧

反动的声音有两种代表：其一，特色专制政府；其二，资产阶级精英人士（商界，文化界……）。

专制政府需要张桂梅这样的“道德楷模”来装点门面，是因为它仍然挂着自己已经不再是的“社会主义”招牌，却又要处于资本主义剥削和专制制度压迫下的劳动群众对这具死尸抱有幻想。这种声音强调张桂梅的党员身份和“信仰的力量”，与党的教育方针、扶贫政策以及爱国主义题材联系起来，成为宣传和思政教育的素材。但是，他们尽力回避问题的实质：巨大的城乡地域差距、阶级分化与底层劳动群众的贫困、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的“二等公民”地位，根源并不是他们所声称的“发展的不充分、不均衡”，而是来自资本主义以至非资本主义压迫的复辟进程。专制政府对于这些问题，自然没有意愿去解决，只是做点表面文章，在有助于维系自身统治的意义上和限度内制造一点改良的假象。可以发展乡村教育，但是为了给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韭菜，不能触碰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可以帮助底层人民或贫困地区，但要在党的领导下扶贫，不能搞群众运动；可以改善女性的处境，但不能动摇“家国一体”的父权制根基，不能搞“女权”。总而言之，只有跟党走、不触碰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根基的“改良”才是“正能量”、“主旋律”。

虽然张桂梅显然不是革命的，但还有许多从事底层公益的改良主义者，让专制政府忌惮他们的“改良主义”背后是否有潜在的反专制意图。毕竟，革命者不反对改良本身，而是把它作为准备革命的跳板。专制政府将这些在自己看来有革命潜力的力量有选择地收编进体制允许的范围（同时铁拳打击超出这一范围的尝试），是一种“消极革命”。它借助自身合法性，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这些实干家的工作归结为“党的正确领导”，一方面洗涤了那些怠惰于最基本的改良工作、与资本积极合谋的官僚的坏名声，另一方面阻止进步力量孕育出更激进的甚至革命的倾向。这种策略，既在政治上消灭了对手，也在意识形态上加强了欺骗。

相比之下，当前资产阶级精英人士对张桂梅的吹捧倒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张桂梅塑造成类似于武训（或者洋气一点的版本，特蕾莎修女）的形象。例如，有些自媒体会将张桂梅描绘成类似于武训的“乞讨办学”，有些则会与那些“慈善”企业家捐款办学的事迹并列。我们可以看出背后的意识形态企图：尽管这些办学者代表的阶级性质截然不同，但在掩盖阶级秩序的意义上是一致的。《我本是高山》这部电影的导演进行了赤裸裸黑帮性质的意识形态塑造，可惜他们拙劣的手法遇上了多少带有民主主义情绪的观众。

一些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的声音正确地指出了导演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首先是对贫困人群的污名化。例如，电影中贫困山区的女学生，由于家境困难加上重男轻女，连凑齐上学费用都困难，甚至用不上卫生巾，竟然有钱有闲，逃学去逛街买东西、上网吧！如果说这不是导演在以布尔乔亚叛逆少年的形象错误地想象贫困女孩的动机，只能说这反映了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真实意图，它要榨尽劳动群众血汗同时为之提供虚假的满足！

其次是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布尔乔亚式抹杀。张桂梅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而坚持扎根乡村女性教育，而电影中却始终飘荡着亡夫这个“大他者”的灵魂，好像她是出于对丈夫的精神寄托或者说“移情”、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才从事这项工作，这只能说是资产阶级文人的贫乏想象力的表现。当然，张桂梅没有认识到她认为自己献身的“社会主义事业”只是给一个堕落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权做了嫁衣。

值得讨论的还有电影对女性的污名化。上文所提到的对女学生的歪曲塑造是一个案例，其中隐含着一种在“左男”中也普遍存在的预设，就是女性天然是小资产阶级性的，倾向于审美和消费主义，并且可以通过交换身体（美貌、性服务、生育能力）而获得资源，而掩盖了背后父权制压迫和女性无权的事实。这同样体现在女孩的家庭关系中。真实原型中酗酒家暴、不做家务不干农活的父亲被篡改成母亲，受害者反倒成了施暴者。让女孩逃学的原因与其说是外部花花世界的吸引，不如说是从她们母亲的境遇中多少洞察到了自己的未来轨迹，从而要逃离这个恶臭的环境。毕竟在传统观念中，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读了书也是要嫁人的，只有男孩才有权出人头地。读书考学是一种逃离的方式，但只适合少数聪明的幸运儿，在教育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外出打工则是大多数底层年轻女性摆脱无权的基本方式。尽管在工厂里受到剥削，但这些微薄的收入只要能自己支配，都带给了她们在原生家庭或者结婚后在夫家很难享有的自由——哪怕只是买几件自己喜欢的漂亮衣服、和姐妹们一起出去吃个夜宵。如果“左男”说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性”的诉求，我们只能告诉他们，这表明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工人阶级女性和其她女性劳动者这里甚至根本没有得到关注，正是因为她们被当成“二等公民”或者说男权的附属品，才不得不首先争取那些看起来仅仅是民主主义的经济自主权和婚姻自主权！

女性的困境也表现在乡村女教师这样的底层小资产阶级女性身上，生育影响工作和难以忍受艰苦环境是导演对她们的潜在指控。电影中，一位后来成为教师的女学生，因为意外怀孕和带娃看病跟张桂梅起了冲突。张桂梅仿佛冷面无情、只考虑工作效益的官僚或雇主；而这位女教师表示实际上张桂梅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对她很温柔。张桂梅的这一面，在黑帮看来是不够理想、需要“艺术加工”的。另外一个案例是一对来支教的小情侣，男生决心扎根农村教育，女生则受不了艰苦环境想要离开，倒逼男生在恋爱和学生之间二选一，还背后骂张桂梅“老巫婆”。言下之意是，这些小布尔乔亚女性“娇气”、“矫情”、只顾私人利益、没有理想情怀。然而，专制政府和资本家在迫使劳动群众为他们的利益“牺牲”的时候不也正

是打着“情怀”的名义吗？就算年轻女性在统计学意义上比男性不愿意扎根农村甚至是返回老家的小县城，也不能说明她们具有比男性更多的“小资产阶级性”。问题在于，相比于城市，这些农村地区的社会环境对女性更加严苛。例如，女教师被性骚扰的情况不在少数，如果校长不是张桂梅而是个男性，可能就被压下去了，但电影显然不会拍这样的片段。导演也不会合理地联想，如果小两口在此结婚生育，带孩子、家务活最后会落到谁的头上，女教师会不会因此在工作中与上级发生冲突。

一些评论直指电影割裂了女性群体，通过把张桂梅这样“伟光正”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关联起来，从而消解广大女性自身的潜能。电影中刻画的诸多女性中，张桂梅仿佛是一个异类，能够与那些“先进的”男性并驾齐驱，要么在男性（亡夫）的精神指引下，要么自己去女性化、向男性（官僚或雇主）看齐，与大多数女性的“落后性”作斗争，拯救逃学女生、酗酒妈妈、娇气的女教师。男性导演自己的“厌女”心态竟被安在了主观上意图用教育改变底层女性无权地位的张桂梅身上！仿佛女性自身是她们被压迫处境的根源，而背后施加结构性暴力的男性则一个个得到了升华。

这些来自民主派的批判声音揭示出了专制政府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共性与裂痕。共性在于对劳动群众和女性的潜在革命性的否定和压制，只不过前者更多通过改良的表象掩盖其真实处境，后者更多通过比较直接的污名化。裂痕在于，专制政府还需要顾忌其名实分离造成的合法性危机。

在遭受到观众铺天盖地的批判之后，《我本是高山》的编剧和《中国电影报道》亲自下场舌战。两个编剧大声谩骂，那些怀疑影片“分裂分化女性”的人是在污蔑张桂梅，《中国电影报道》则将批评通通视为对于中国电影事业“恶意的有组织的诋毁声音”，要么是境外势力，要么是蹭热度的营销号。然而，这种目空一切、转移矛盾的公关态度，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专制政府看到群众的怒火威胁到自身对于张桂梅的“主旋律”宣传，也不得不紧急叫停这部电影。

需要指出，在批判《我本是高山》的声音中需要警惕一种论调。这些人认为，这部污名化女性、消解社会主义理想的黑帮电影之所以还能上演，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渗透，丑化中国人，到西方去拿奖。讽刺的是，电影的辩护士把批评者视为境外势力，这些人也反过来将他们视为境外势力，二者其实同样属于民族沙文主义对于阶级矛盾的转移。因此，这些“批判”最终会与专制政府的立场合流。

（3）民主派群众对张桂梅的肯定及其局限性

具有民主派色彩的群众在批判上述两种反动势力时，也在表达对张桂梅的赞颂。他们的共同点在于肯定张桂梅的理想主义精神，以及对于贫困地区女性做出的重要贡献。其中也有两种不同的色彩，一种是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另一种是激进女权主义者。

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其中有不少是基层党员，尽管对专制政府的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大环境存在不满，拥护性别平等、教育平等之类的理想，但仍然对党的改良抱有很大幻想。张桂梅的女学生，或者与之地位类似的受教育女性，往往属于此列。比如一位出身农村贫困家庭的女教师，可能会认为自己能有机会受高等教育、改变命运，要归功于社会主义的政策、归功于党和国家的培养，所以在自己当了老师后，也要把学生培养成“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栋梁之才。顺便提一句，在张桂梅培养出的学生里面，有许多从事了教师、医生、警察、军人这样非生产的体制内职业，与专制政府存在相当紧密的联系。这些人可能在实际工作中具有像张桂梅一样的“社会主义信仰”，做出了一些有益的具体工作，胜过那些把持既得利

益的前辈，但这种改良绝不可能超越专制政府所设定的界限，实质上是帮助它巩固了摇摇欲坠的保守秩序。

激进女权主义者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赞扬张桂梅。她们对于专制政府即使不是直接反对，也是不抱希望的。这是因为它被视为父权制秩序的总堡垒，例如“婚姻冷静期”这样的政策，劝女性回归家庭和生育的口号，法律实践中对家暴、就业歧视、性骚扰等的纵容。她们更加强调张桂梅给女学生带来了独立性和自主权，免于陷入辍学结婚生子的循环，能够通过更高的教育水平提升经济独立性，从而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如果有女学生最终陷入了这个循环，例如当了全职家庭主妇，才是辜负了张校长的培养。我们应该坚决支持其明确的反对父权制压迫、争取女性“自决权”的民主革命诉求。但是，她们并没有将女性解放的任务与推翻专制政府和资本主义的任务结合起来。比如她们认为，实现性别平等的方式是经济独立（“搞钱”）、摆脱与男性的性缘关系。但如果不结合阶级斗争，如此能够实现的最多只能是上层女性的“独立”，却不能回应广大工农阶级女性的困境。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迫切需要注意深入了解女性从生产、再生产到社会地位方面的各种被压迫情形与诉求，研究、改进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女性解放纲领，在此基础上将更多先进的女性纳入革命队伍，从而改变先锋队内男性占主导、相对忽视性别问题的情况。

另外，在教育平等问题上，民主派也未能超出当前制度的局限。首先，即使教育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平等分布，资产阶级子弟仍然能够通过家庭教养、社会关系、花钱补习培优等方式获得优势，实现阶级再生产。其次，教育内容中包含大量脱离生产实践的知识（“马尾巴的功能”）乃至灌输的意识形态（思政课程）。最后，以高考为中心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基础仍然是优绩主义的个人竞争，符合资产阶级法权。张桂梅的学校虽然尽可能提高了当地的教学质量，但不可避免地服从了上述逻辑。我们必须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教育应该告诉受教育者如何实现“教育为工人阶级服务”：在消灭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将教育选拔的原则从个人竞争转化为集体协作，让生产实践与科学知识重新结合，让政治教育从反动的灌输转变为结合理论分析与革命实践的纽带。

欢迎关注TG频道《列宁道路》：https://t.me/RoadofLenin。志同道合的同志请加入《列宁道路》读者群：t.me/lieningdaoluduzhequn。

欢迎向《列宁道路》投稿。工厂通讯、时事评论、理论分析等方面的文章均可，尤其工厂通讯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投稿邮箱：leninroad@proton.me。